

# 东亚国家民主化进程的影响因素分析： 以韩国为例

谢晓光

(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内容摘要：**东亚国家的民主化是一个系统的转变进程，一方面既是历史和文化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是外部力量介入的制度变迁的产物。文化特别是传统的儒家政治文化对韩国的民主化进程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对韩国民主化进程起到了“双刃剑”的作用，公民社会的完善是促进韩国民主化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韩国 民主化 传统政治文化 中产阶级 公民社会

## 一、东亚国家民主转型理论文献评述

在西方，往往完全从制度和程序上定义民主。约瑟夫·熊彼特认为，民主是一种形成政治决定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下，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出决定的权力。塞缪尔·亨廷顿更看重竞争性的选举，认为这是民主的本质。罗伯特·达尔在民主问题上著述颇多，他详细阐述了民主的定义，但仍只是单纯地强调民主的程序和制度特点：举行自由、公平的定期选举，进行有组织的争论；几乎所有的成年人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民众有出版、集会、言论、请愿和结社的权利。政治民主化需要五个相互关联的条件才能得以巩固，即：有活力的公民社会、相对自主的政治社会、法治、可资利用的官僚组织（usable state）以及经济社会，任何一个场域都与其他场域相互作用、互相强化。依据不同的标准，可以有许多划分政治转型的方式。夏尔根据领导权和持续性原则，提出了渐进、决裂、斗争、和解等四种民主转型的路径。亨廷顿则从谁领导民主化进程分为变革、置换、移转等三种。东亚政权转型实际上存在“三种类型”：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的政权转型属于“决裂”模式，韩国是“转移”模式，我国台湾地区则具有所谓“改革”模式的一些特征。

美国学者斯蒂芬·哈格德和罗伯特·考夫曼在当代政治经济学理论及亚洲

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发展了一种研究民主化转型的新视角，从分析经济危机和威权退却的关系开始，继而分析了威权统治的经济和制度遗产如何影响新民主政府发动和保持经济政策改革的能力；美国学者霍华德·威亚达尔在介绍依附理论、官僚威权主义、有机国家主义和统合主义的兴起之后，对亚洲新兴国家成功及其启示，发展中地区民主化等进行了详细的论述；美国学者斯蒂芬·哈格德在指出新古典和依附理论都忽视了国内政治之后，从国际系统、国内联盟、政治制度和理念四个分析层次对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路径或者产业战略的选择做出了解释，提供了不同的增长战略有着不同的政治基础或者政治条件的视角。已有对东亚国家转型理论的研究，多数是依靠政治学理论和历史学的描述方法来进行论述的，而在东亚文化价值观和政治制度变迁之间内在的联系与规律少有提炼。在我们继续强调民主基本要素的同时，还应在实际运行时允许在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里设计最适合自己的制度体系的民主制度。由于历史的发展和时过境迁，在全球金融危机蔓延的背景下，东亚国家的良好表现，使得东亚政治发展模式成为一种新的可供思考的发展范式，东亚的民主化进程越发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

## 二、东亚国家民主转型的实践

东亚地区 30 多年来深刻的制度与社会变迁使其成为转型国家的样本与范例。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变迁，主要是指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从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向着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民主法治体制的变迁。东亚国家的民主化是一个系统的转变进程，从本质上说，是寻求建立更为合理的政治体制和有效的治理体系，它的成功与否直接决定了民主化是否真正地彻底完成。东亚国家与全球中其他国家的政治转型相比，尽管呈现各自的差异性和复杂性，但不难发现，它们还是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首先，政治转型的前提为，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是在权威主义体制背景下展开的，转型的目标是自由民主。其次，这种政治转型以整个社会政治权力结构、社会政治生活的深层变化为内容，而不仅仅是政治上层变动或某些具体制度的调整，它通常涉及宪法的重新制定或修改、国家重大制度的创新。再次，这种政治转型以国内的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快速发展和深刻变革为基础，而不纯粹是受国际因素的影响，也不局限于政治领域。也就是说，转型是新旧体制自然交替的结果。而东亚国家的民主转型进程又具有自己的特色，即威权政治体制在民主化进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它是民主化进程的产物，是民主化进程中制度变迁在政治结构体制上的反应，这种反应受到了殖民主义的历史、前现代化的经济结构、政治文化传统等

因素的重要影响，同时也受制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即时事件的作用。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并不是简单、直接的逻辑关系，威权政治体制相对于其他国家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不在于其经济发展战略或政策的合理，而在于政权的能力。经济绩效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政权的合法性。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蔓延，东亚各国能够独善其身，使得世界开始深刻审视东亚模式。东亚的民主一方面是历史和文化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是包括外部力量介入在内的制度变迁的产物，东亚的经验验证了20世纪80年代研究民主化转变的学者所提出的类理性选择方法：民主化解决是当权者所面临的问题，当收益超过成本时它就得到实行，它来自上层而非底层。经济基础相对薄弱是东亚国家选择威权政治的重要原因，所以强政府在一定时期对本国的现代化进程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而随着现代化发展和社会变迁导致威权政治体制内部的专制结构和同意结构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这种张力是威权政体不稳定的根源。威权政体试图建立各种协调机制缓解张力，但政权的性质决定了专制结构的地位不可能被取代，从而也就决定了政权不可避免地要进行制度变迁。因此，东亚的威权政治实际上是对传统专制主义的发展和扬弃，它作为一种特殊的过渡形式，必将随着东亚社会的发展走向成熟。

### 三、韩国民主化进程的影响因素分析

#### （一）传统政治文化对韩国民主化进程的影响

文化，特别是传统政治文化对韩国的民主化进程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儒家文化对韩国整个政治秩序的维护和对社会价值的引导等渗透其中。“儒学的价值强调在解决社会结构的矛盾时不是通过阶级矛盾，而是通过社会磨合。这对防止韩国社会矛盾走向尖锐的阶级矛盾作出了贡献。”而且近代史上文化的更新和过滤、政治上的选择和民族精神的觉醒都没有直接对儒家文化造成多大程度的破坏和冲击。儒学在韩国政治文明里就没有根本的否定和尝试彻底的抛弃过。韩国在政治选择上青睐于西方制度的模仿，而在政治文化的取舍上几乎是“无意识”地对儒家文化有所保留，这种保留也得到了涵盖儒家文化的几乎各个领域价值系统的默许和共融。“受现代西欧的影响而急剧变化的韩国社会，一般对统治阶层的传统文化持否定态度，但是儒家式公理性是个例外，它因为具有西欧公理性同样的改革指向和批判权利的特征，而被积极地继承下来。”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对儒家文化的深深认同和传统政治文化的刚性，使韩国迅速发展成为现代化国家的同时，进而转向市民化、参与化方向，因此厘清传统文化和现代政治的关系，加速政治发展和社会不同系统的调适，才能真正促

成韩国政治经济的快速发展。

从政治文化因素对韩国民主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可以看出，在政治转型过程中，尤其在设计民主转型模式时，要充分考虑到政治文化背景的复杂性和由此带来的积极和消极的影响，使民主转型模式更加符合本国社会的要求和时代发展的需要。政治文化传统深刻地影响着政治转型进程的模式选择，并进而要求加强政治转型过程中国民政治文化的整合能力。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转型来说，政治文化传统就像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悠久绵长的政治文化传统是前进过程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另一方面，悠久绵长的政治文化传统也是国家转型过程中沉重的包袱，增加着政治转型的阻力和难度。从韩国现代权威主义发展模式，我们不难看出其儒学主导型传统文化的遗迹。一国深层的文化传统和历史积淀因素在影响政治发展方面可能起重要作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均不能以否定自己的政治历史传统来实现现代化的挑战，而是应该从传统政治文化中找到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连接点，重新构建“民族主体文化”，并以此作为精神动员的工具。民主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只能用渐进、徐缓的方式逐步加以完成。尤其是传统文化根基比较深厚的国家，从国民政治文化的整合能力方面分析，更适合采取渐进的政治转型模式。韩国正是在渐进的制度革新基础上，其传统文化的因子和民族独特性也渐变为民主政治的合理资源，使民主转型期间保持了政治社会秩序的基本稳定，减少了转型可能导致社会动荡所付出的代价。

任何一种政治体制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必须与一定的经济、历史、文化等多种因素有机契合，才会有鲜活的生命力。制度可以被移植，但它必须适合移植后的土壤，否则必将枯萎、死亡。新加坡前总统李光耀说：“没有人可以忽视一个社会历史、文化和背景，几千年来，各社会都各自以不同的速度和不同的方式发展。他们的理想与标准也各不相同。20世纪末期的欧美标准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因此，政治形式的选择，不能简单地移植，照抄照搬，不仅要考虑是否适合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由其决定的经济形式，还要考虑该国的历史、宗教、文化传统等民族特点。亚洲发展中国家在选择自己的政治模式和发展战略时，必须根据各自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经济社会现状，建立和发展适合自己的民主政治形式。威权主义可能是亚洲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一种政治选择，其应当根据本国的文化传统和经济发展水平来推进民主政治。如果幻想仅仅靠新制度的引进与“嵌入”就能解决问题，这样就会出现转型过程中的“水土不服”症状。对于亚洲发展中国家而言，在转型的初级阶段，推行威权主义政治体制有利于增强国家的凝聚力，国家意志有利于形成社会整体动员机制，使国民经济得到超常规的发展，推动现代化进程。但是，威

权主义政治体制的弊端是容易使社会发展成本增高，表现为官僚机构的权力膨胀却没有有效的制约机制。因此，亚洲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经济发展目标之后，应当及时地向民主的政体转型。诚如韩国前总统金大中所言：“更为合适的是探究亚洲的传统力量如何为更好的民主政体创造条件。在亚洲，民主能够促进更好自立，并同时尊重文化价值。这样的民主才是唯一真正的人民意志的表达，只有这样，它才具有合法性并反映国家的观点。”

## （二）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对韩国民主化进程的作用

亨廷顿指出：“中产阶级的形成像经济发展一样，常常是极不稳定的因素。——中产阶级的进化可以分为好几个阶段，典型的情况是——首批出现的中产阶级分子是最革命的；但随着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它也就变得较为保守。”“几乎每一个国家民主化最积极的支持者都来自城市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是考察韩国民主化进程的一种十分重要的理论概念工具。中产阶级不仅是市场经济发展导致阶层结构变化的产物，而且也应是现代化背景下社会转型的产物；社会发展是社会运动的必要条件，而中产阶级的形成则对社会运动起了重大作用。

在威权统治初期，韩国中产阶级对政治制度的运作和实效的评价是：以效率为主要价值评价标准；对政府的评价具有较强的功利性；对政府的评价标准的单一性使其对政府的评价具有片面性和短期性。在威权统治后期以及民主政治建立之后，中产阶级对政府的评价呈现了价值理性为主、工具理性为辅的特征：由以效率为主转变为以民主为主要标准；政治评价逐渐转变为对民主价值的追求，许多中产阶级组建了非政治性、非营利性的团体，关注环保、妇女权益等问题；评价标准多维性，对政府的评价具有全面性特点，以政治自由的实现、人权的保障、民主制度的完善为主要的的评价标准。如果说工具理性为主的评价取向使中产阶级向威权统治妥协，顺从威权统治，从而实现了自身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但迟滞了民主政治进程，那么价值理性为主的评价取向转变使中产阶级成为民主政治发展的推动者和参与者，而中产阶级特有的妥协理性正是民主政治需要的一个基要因素。

中产阶级的政治文化转型决定了其政治态度的变化，政治态度的变化与政治稳定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韩国中产阶级的政治文化转型与威权统治的一致与冲突表现为：威权统治早期，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是保守的，有利于的社会稳定。随着中产阶级政治文化转型，在威权统治后期，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逐渐激进，他们参与了反对威权统治的民主化浪潮，并使韩国实现了由威权统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在这一时期，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是不利于社会稳定的。中产阶级政治文化转型与民主政治的存在着相当的契合：韩国在威



功地实现了威权统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之后，中产阶级趋向于保守，此时民主政权虽然面临众多的情景问题和体制问题，但总的说来整个社会是稳定的。韩国的民主政治在中产阶级的强大支持下不断巩固和发展。中产阶级政治上由激进走向保守，主要是其政治文化与民主政治的契合所致。表现在：民主政权在肃清威权主义遗留的一系列问题上取得的成就增强了中产阶级对民主政治的信任；民主政治的制衡理念以及自由的价值取向与中产阶级的制衡意识和自由意识相符；民主政治的核心理念与中产阶级的妥协意识契合。在不同的民主化进程中，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是不一致的，社会和政治稳定也与政治态度密不可分，中产阶级保守的政治态度有利于政治稳定；中产阶级激进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可能意味着政治不稳定。

### （三）公民社会的完善是促进韩国民民主化的重要因素

韩国1987年6月的“改宪运动”过程中，公民社会通过各种抗议和示威活动给政府造成了相当大的压力，当时处于执政圈内的改革派逐渐认识到政治改革是大势所趋，最终采取了对话和妥协。与1980年制造了伤亡千余人的“光州事件”相比，1987年的民主运动达到了高潮，尽管这次运动规模比以前更大、范围更广，却相对和平，公民和代表国家权力的暴力机器之间的对立都控制在非常小的尺度内，使韩国实现了平稳的转型。实际上，1980年之后韩国国内的政局就逐渐进入了平稳期，经济增长速度有了较大的提高，也把通货膨胀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公民社会在韩国国内的主体地位更加突出。与1980年之前的动荡不安相比较而言，这样的社会经济环境更有利于民主转型的平稳过渡。

经验表明，公民社会模式是任何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大量逐渐成熟的社会政治意识、不断完善的经济社会条件、逐渐增长的民众民主意识，公民社会最终形成，这显然不是依赖于国家的力量。国家强权无论存在与否，但公民意识的形成和成长已经是不可逆转的社会潮流。公民社会必须具备社会文明的基本特征，只有公民社会的发展才能促使民主转型的巩固，在韩国，不断被强化的NGO等社会组织力量，使其公民社会由成长进入成熟阶段，并逐步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扎根。现在，韩国的公民社会已经从要求单纯的政治自由发展为参政议政的理性公共性组织。根据前述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基本理论，这一现象的出现，正说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需要有政治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为基本条件。要使民主转型得以巩固，必须使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具备自由发展的条件。由于韩国以市场经济实行一元化统治，这让运用市场经济原理治理的政府使大部分资源从政治中分离出来服从市场分配原则。导致共同的利益和市场使社会逐渐走向多元化发展，而这种多元化的社会正是通向

公民社会的必由之路。

公民社会与民主化进程之间是共生互动的关联关系，而非前因后果的促进关系。活跃的公民社会不仅推动了政治变迁，创造了政府和国家，从而启动了民主化，而且还可以防止逆转，从而推动转型的完成，有助于巩固和深化民主。因此，无论在民主化进程的那一个阶段，积极和独立的公民社会都具有着重要的意义。

##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zation of the Factors in East Asian Countries: A Case Study of South Korea**

Xie Xiaoguang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iaoni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in East Asian countries is a systematic change, on the one hand, it is the product of both history and culture; on the other hand, the involvement of external forces. South Korea's Confucian culture has a decisive influence on the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The involvement of the middle-class in the South Korean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has played a "double-edged sword" role. Perfection of civil society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promoting the democratization of South Korea.

**Key Words:** South Korea; democratization; traditional political culture; middle class; civil society